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西方汉学”：跨文化的对话

对于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最近一二十年来，显得十分热闹和时髦。但是什么是汉学，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看法。主要的分歧是，第一，汉学研究是否包括中国本土对自己的研究？是否只是外国对中国的研究？第二，汉学研究（Sinology）与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有没有区别，是否前者就是专指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后者专指对现实中国的研究？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词语的定义和研究领域的划分问题，此处不论。下面我们只谈第一点。

从目前发表的许多论文、出版的一系列译著和论著看，逐渐占上风的是这样一种声音，即认为汉学是国外或者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是与“国学”相对的一个学科概念。在种种关于“汉学”与“国学”的讨论中，尽管还有分歧，但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平衡“汉学”与“国学”的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一致的，就是“汉学”与“国学”是相互对立的两个学科。但事实上，这种对立似乎缺乏必要的依据。西方汉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这当然没有问题。或者干脆说“汉学”就只是特指西方（或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问题是，把“汉学”独立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否要有国别的区分？如果有所区分，其根据是什么？

应当明确，“汉学”与“国学”是两种语境下的产物，分别有各自的学术史背景，这就决定了不能贸然将二者对立，就像进行文化比较时首先要遵循必要的规则。如不少专家所言，“汉学”是舶来品，其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范畴，是西方学术界根据他们的研究对象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对西方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学科。“国学”的概念则显然是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学大潮滚滚东来时诞生的，是中国人感受到一种异质文化的压力时作出的回应，矛头所指的是“西学”无疑。就此而言，在“国学”与“汉学”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可对立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学人努力引进西方学术的研究体系来改造传统学术研究时，“国学”这个概念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更加彰明，与“西学”的对峙也更加强硬。这正说明了“国学”与“西学”的对立是基于二者研究对象的迥异。反观“国学”与“汉学”，二者的对立之所以不成立，根本点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同一，都研究中国的文字、语言、历史、文化等等。在解析这些概念时，其实也就涉及到学科的界定问题。

“国学”与“汉学”的研究主体固然不同，但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以研究主体的区别作为概念对立的依据，岂非在学术研究中自设壁垒，颇有自蔽于同行之嫌。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一名傅海波，Herbert Franke）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汉学》（Sinologie），^①这是学术指南丛书“东方学”系列中的一本，其中介绍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情况，就包括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实，我们只要接触过、阅读过外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就会知道，他们从来不自外于中国同行。恰恰相反，他们热衷于与中国同行的学术对话。原因很简单，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认识的主体是人，研究对象（比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客体。正如数学是全

^① Herbert Franke, *Orientalistik*, 1. Teil, Sinologie, Bern, 1953

世界的人都研究的科学，欧洲学也是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都研究的学问，中国学当然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都研究的学问。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提出取消“汉学系”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语言”等名目，不管是不是有批评者所说的“急躁”之病，至少他正确地理解到中国文化的各项内容可以作为全世界人研究的对象。

研究主体不同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区别，我们不能按照主体的不同来划分学科，同样无法以研究方法构筑学科的分野。方法的流动性很强，一类方法可以运用于许多学科的研究，采取不同方法的不同学者之间还可以兼容互补，这种通用性与流动性导致由方法所界定的往往是学派而非学科。几年前（1997），在一次关于德国汉学的回顾与展望的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祖费雷发表了《从法国人的角度看德国汉学的发展》的文章，其中提出了“民族汉学”（*national sinologies*）和“国际汉学”（*international sinology*）的概念，认为民族汉学就像民族传统一样应该加以保护，因为它是抵抗千篇一律的僵化面孔的积极因素。但是民族汉学应该更多地被介绍、被评论和被摘要到国际性的刊物（英文学术杂志）中，才能被国际学术界所了解和认识。^①这里所谓“民族汉学”主要是指学术研究的特色，事实上就是因浸润研究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带来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上的特色，其根本立足点仍然是汉学研究的世界普遍性特征。但是为什么有“民族汉学”，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汉学家的主体差异性特征。

毕竟，西方汉学确实有不同于中国人本土研究的地方。后者是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前者是与他者的对话，是对“非我族类”的审视。研究对象虽然相同，但是主体条件、主体与对象之

^① Helmut Martin und Christiane Hammer (Hrsg.), *Chinawissenschaften.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amburg, 1999. （《中国学在德国的发展：历史、人物、展望》汉堡，1999年。）

间的关系确实迥然有别。因此，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虽然也有个体的差异，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这就说明身为中国人来考虑西方汉学的独特性时，不能拘泥于学科的概念畛域，而只能从跨文化的对话、从比较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认识，它才能构成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总之，西方汉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对话。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西方汉学也是人类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学术层面意义上说，西方人研究中国与中国人研究中国没有什么两样。高本汉的中国语言研究、伯希和的西域史地考证、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即使对于中国同行来说，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国维以来的许多中国学者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引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者与之商榷，就是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西方汉学的学术成果为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者所关心。例如，费正清的中国历史研究、谢和耐的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薛爱华的唐代外来文明的研究等等，所有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都应该重视，都应该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参与西方汉学所涉及的各个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是相关领域的专家的任务。

西方汉学本质上又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对话。由于研究者主体条件的特殊性，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被一些有着异样经验和文化历史背景的西方学者所理解和消化，从而产生了“西方汉学”。如果不从文化关系上来讨论西方汉学，那么单纯的汉学研究就只具有学术情报的性质。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西方汉学的发展和繁荣，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历史上看，汉学的发生和发展有个过程，是与“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一个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汉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西方学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价值观念、学术背景和意识形态也不同，当他们

以自己的母体文化为背景研究中国文化时，其中必然会折射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于是西方的中国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就成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正如福赫伯在总结 19 世纪欧洲汉学的历史时所说，虽然这些汉学遗产在具体研究结论上已经落伍，但是“十九世纪的汉学史，应该成为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汉学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种手段，19 世纪汉学在欧洲形成一个学科，表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有系统方法、明确意图以及理论背景支持的阶段。而汉学学科的萌芽阶段，即传教士时代，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学术研究的认识阶段，但也有其比较明显的方法体系。在中西交往的早期，传教士时代之前，认识则是随机的、笼统的。到 19 世纪之后，经过学术规范包装的这一认识体系，在传递西方的文化、历史、价值观念方面自然更加便利和有效，但同时它也体现出一种文化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不同于传教士们以认同中国文化为前提，是明确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解读。这是 19 世纪前后两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差别。不过传教士们虽然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文化，同时代在本土的欧洲人则不然，他们是使中国文化融入本土经验。因此，本土欧洲人与在华传教士打造出的汉学模型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也是在华传教士与在本土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这两种差别的存在，使得传教士时代成为一个特征明显并且孕育学术性汉学的时代，或者说分水岭时代，这也与欧洲综合实力的转折期相吻合。

正是出于对汉学文化本质的如上认识，本书才将注意力投向汉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登堂入室之前的漫长时光。也正因为这样，在下面谈到“西方汉学”或“汉学”时，所指的更多是其文化意义而较少学科内涵。

转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8 页。

第二节 寻找东方 欧洲商业殖民势力的东来

西方汉学的发轫时期是公元 16—18 世纪。这也是西方商业殖民势力向东方及世界各地大肆扩张的时期。1499 年，达·伽玛率领两艘满载着香料的船只从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回到里斯本，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安全抵达故乡的港口而松了一口气。过去那一幕幕同海盗们残酷的战斗记忆犹新。令他欣慰的是，由于欧洲市场上的香料价格持续猛涨，他带来的香料的价值在抵偿此行的昂贵成本之外还有盈余，从而使此次冒险航行具有了商业价值。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一批批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和使节，正是从这条航线驶向远东，远东的文明和文化又从这条通道输入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

自古以来，西方通往远东的道路主要是陆路，如果走海路，那也必须从波斯湾或者红海进入地中海。大西洋沿岸是与东方关系的边缘地区，欧洲历史 and 外贸的中心舞台是地中海地区。所以中亚和西亚地区特别是 7 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始终在东西方贸易中处于关键地位。元朝的建立，建起欧亚直接交往的通道，像马可波罗一家这样的欧洲商人可以畅通无阻地从事商业活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王室之余部逃亡到西北，建立了北元。明朝政府与漠北蒙古余部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沿着北边及西北长城一线都布满了重兵。在中亚地区，帖木儿帝国的兴起和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增长，使得中西陆路交通发生梗阻。

地中海边的意大利诸城邦，如威尼斯、热那亚自古以来便是欧洲与东方贸易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贾辐辏，丝绸、香料和各种珍贵的奢侈品自远东经这里转运往西欧各地。

经商需要信息，经商也带来信息，中世纪的意大利人最热衷

于东方旅行。但他们的旅行大多是横贯亚洲大陆，即使从水路也是搭乘亚洲人的船只。威尼斯人的帆桨船只适宜于在地中海水域航行，不能用于远洋运输。帆桨船是欧洲国家海上霸权的象征，属于国家的财富。国家通过拍卖其使用权支持商人们的海上贸易。至少地中海东部地区可以安排每年两度的商业航行，满足市场对于东方商品的需求。这种机制节省了商人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使他们得以在商品销售上投入更多的钱，加速了资金的周转，提高了他们的机动应变能力。发达的银行系统也能够迅速有效地发展贷款和汇兑业务。因此，15世纪困扰欧洲许多地方的钱荒问题，在这里可以通过帐面结算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然，威尼斯人这种迅速快捷的机制背后也隐藏着危机，这就是不堪战争的打击。一旦发生战争，整个运转系统就会瘫痪，如1499年由于威尼斯与土耳其的战争，导致了银行业的破产，迫使海运业中断。这一年欧洲市场上的香料和胡椒价格猛涨，使达·伽玛从印度洋花巨额代价运来的两船香料卖出了好价钱，出现了盈余。

战争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也的确是家常便饭。因为威尼斯人东方商业网络就是建立在武装控制海上通道的基础之上的。东方来的珍贵商品要么通过被埃及苏丹控制的红海，要么经由地中海东部（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希腊等地区）的水路，输送到威尼斯商人手中。热那亚人对于威尼斯人的收益当然十分眼红，他们虽然由于与哈伯斯堡家族结盟而十分强大，但是终因内哄频仍而受到削弱，以致无法像威尼斯那样维持一个海上通道的监控系统。威尼斯人维持其海路保障系统的资金，必须通过海关和赋税来筹集。商人们必须以其利润的12%来支付这笔钱，为此，只有通过贸易垄断才能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地位又需要武装控制的商业通道来保证。自从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消灭了拜占廷帝国后，威尼斯人的这套海路监控系统便越来越受到威胁。1517年土耳其人把埃及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威尼斯

人更被迫必须作出妥协的姿态。海上商路的通泰取决于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极为不稳定的双边关系。在土耳其与哈伯斯堡王朝这两个宿敌之间，威尼斯见风使舵，被双方都认为是不可靠的。

威尼斯在东方贸易中的居间牟利不知引起多少的垂涎和嫉妒。法国人的动作且不说，葡萄牙王室也力图寻求到东方的海上通道。热衷于航海事业的亨利王子把沿东非海岸的航行不断向前推进。他的侄子约翰二世（1481—1495 年执政）也是航海活动的热情推动者。1488 年迪亚斯成功地完成了非洲好望角的航行，找到了通往印度洋的海路。葡萄牙人从事海上探险的热情首先是为了黄金。15 世纪的欧洲是“烂钱”流行和钱荒危机的时代，非洲的黄金丰富而便宜，只要能找到新的黄金来源，欧洲人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从事任何冒险。当然，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和切断威尼斯人补给线的企图，也是欧洲人热衷于开辟东方航线的动力。但是，由于好望角附近的海面过于复杂，绕过非洲南端那个可怕的海角令迪亚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葡萄牙人并没有立即利用这条新航道从事东方贸易。实际的东方航行被推迟到 1497 年，这一年达·伽玛找到了一条平稳的航路，避免了好望角附近险恶的海面，绕过了非洲南端。

从经济角度说，葡萄牙人的这种拖延适得其时。平时欧洲市场的胡椒价格是每 400 威尼斯磅值 50 杜卡特^①，而在 1499 年达·伽玛从印度洋回到里斯本时，由于当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的战争，欧洲市场胡椒的价格大幅飚升，1500 年达到 130 杜卡特。达·伽玛的两船胡椒出售后的盈余，使得第一次印度洋航行具有了商业价值，否则得不偿失也许会减低葡萄牙人开辟新航道的热情。此后胡椒价格逐渐回落，到 1510 年又回到 50 杜卡特的价位。因此，葡萄牙人感到胡椒价格在欧洲市场的弹性十分有限，过多的供给只会压低价格，减少收益。只有皇家垄断起来，才能

^① 杜卡特（Dukate），14—19 世纪欧洲通行的金币名称。

控制胡椒的供应量。因此，在达·伽玛航行之后，一方面皇家加大了检查胡椒走私的力度，而不是打价格战与商人争利，一般商人被排除在胡椒生意之外；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血腥地侵入印度洋，用武力建立商站，控制了霍尔姆兹、果阿、马六甲等战略要地。葡萄牙人甚至想占领亚丁，以便能够封锁红海，但是，他们的控制从来就没有完全得逞。

葡萄牙人很早就想从东南亚进口香料，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比印度有更加丰富的香料供给。皮雷斯在 1507 年就注意到，谁占领了马六甲，谁就能够控扼住威尼斯人的咽喉。尽管葡萄牙人使用了一切残暴手段，也未能完全封锁威尼斯人的香料供给通道，却足以使威尼斯人的香料来源减少，从而抬高欧洲市场的香料价格，使葡萄牙人手中的胡椒获得较高的销售利润。威尼斯人无疑是大受其苦，可是他们却巧妙地唆使马克留木王朝与土耳其去对付葡萄牙人的海上封锁。1534 年，土耳其占领了从巴士拉到亚历山大里亚的所有贸易路线，他们成为威尼斯人所渴望的东方商品的供货方。葡萄牙人不得不放弃海上封锁的策略，转而采取以征收霍尔姆兹海峡的关税和拍卖海关职位的方式来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甚至又一度出现过繁荣。1570—1573 年威尼斯人再次与土耳其人发生战争，尽管他们联合哈伯斯堡王朝取得胜利，但威尼斯的经济却未能复振。特别是瘟疫的袭击和造船木材的匮乏，使威尼斯和整个意大利的港口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进入衰落时期。与此同时，葡萄牙也在衰落。1578 年，年轻的葡王在对摩洛哥的战争中阵亡，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两年后继承了葡萄牙王位。1588 年菲力浦二世在与英国的海战中丧生。这时，走到海上争霸前台的是荷兰人和英国人。

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海战中，雷方特公司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国家支持获得王家商业特许权的海盗式的商业公司，可以在需要时很快地走向战场。这是英国海上霸权的特点。与英国人争风的是荷兰人。从船舰的数量来说，荷兰人甚至比英国人略胜

一筹。荷兰人当时享有欧洲海上承包商的名声，他们的货运船，造价低廉，数量巨大，随时接受订单，可以立即开赴亚洲水域。荷兰人从葡萄牙人那里窃取了不少远东贸易的情报，偷偷打造适合印度洋航海的船舰。荷兰人林韶滕从 1583 年开始在葡萄牙的果阿教区任职。1596 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部书里就披露了葡萄牙人开通到达印度的航线。1595—1597 年，几乎是达·伽玛首航后的一百年，荷兰人的帆船也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把 17 世纪称为“黄金世纪”。

荷兰人的首航抵达了爪哇，此后便络绎不绝。荷兰商人之间竞争激烈，为了防止招致毁灭的竞争，1602 年荷兰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以限制无序的竞争。这与两年前英国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出发点完全不同，英国人的目的乃是为远东冒险事业筹集资金。但是，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来说，资金与船只是十分的充足。在 17 世纪的头十年里，荷兰人在印度、印尼和日本建立了贸易据点。阿姆斯特丹的监事会任命了一位亚洲总督方科恩（Jan Pieterszoon van Coen, 1619—1623 年在任）此人信奉贸易必须有武力作后盾的理论，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修建城堡，使它成为荷兰在亚洲殖民地的管理中心。

荷兰人的船只可以不受季候风的影响，借着持续而快速的西风，从位于南纬四十度的好望角径直鼓帆东行，然后再从澳洲西南向北航行。在这条航道上，印度只是侧面而过，并非必经航站。荷兰人对印度的兴趣主要是可以从那里购进廉价的纺织品，销往亚洲其他地方。这笔转手贸易的利润就成为为欧洲市场购进香料的资金。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纺织品在欧洲同样很好卖。在荷属东印度公司 1670 年度贸易结构中，纺织品与香料的贸易额各占 25%。到二十多年后的 17 世纪末，香料仍然占 25%，纺织品贸易额却上升到 45%。荷兰人还经营亚洲的货运业。自从葡萄牙人残暴地以武力入侵印度洋以后，英国人和荷兰人继承其衣钵，亚洲航运业受到极大摧残。亚洲商人觉得雇佣欧洲人的商船

更加安全和妥当。荷兰人总是有那么多空船，未能及时回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船只可以整年地在亚洲接受货运业务。相反，英国昂贵而快捷的商船一直只是在伦敦和印尼之间往返。经年滞留便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自己造船，改为租赁私人船只。虽然租金不菲，但是这种方法使得英国人像当初的威尼斯人一样，可以把资金充分地投放到扩大贸易上。为此，需要严格的成本核算和船主与货主双方都严格地遵守航行计划。比如，在后来同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就特别需要讲究规约与速度，因为茶叶属于昂贵、轻质而又易坏变质的商品，必须在短期内从广州运到伦敦或者波士顿。

开始是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扩大了对亚洲的纺织品贸易，纺织品贸易与香料贸易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使得欧洲商人深深地介入了亚洲的生产过程之中。欧洲商人试图直接接触那些纺织品小生产者，比如通过预付定金的办法与之建立稳定的供货渠道；比如试图提供欧洲流行的样式让亚洲生产者仿制。这样就加重了欧洲公司在亚洲代办处的工作，它们逐渐从简陋的落脚点发展成为巩固的管理中心，拥有宽敞的仓库，有时还附设具有加工能力的工厂。他们成为欧洲在亚洲实施殖民统治的桥头堡。

当中国茶叶在欧洲普遍受到喜爱以后，东亚贸易在 18 世纪达到了一个飞跃。中国至少从马可波罗以来就是欧洲商人向往之地。葡萄牙人第一次闯入印度洋，就试图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1511 年葡人占领马六甲后，掌握了通往中国的战略据点。三年后第一批葡萄牙探险队就到了广州。不久，皮雷斯作为葡萄牙第一个代表团出使中国，1520 年到了北京。通商之事未成，他本人却锒铛入狱。问题出在外交礼仪上。大明王朝的君主自视为世界最高主宰，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其他国家都是夷狄。对外关系就是朝贡关系，外国使节的礼品都是贡品。皇帝的回赠慷慨大方，决不会斤斤计较。但只有那些按照朝廷礼节行事者，才受到礼貌的接待。若是漠视这套礼节，就被认为是漠视皇帝的

权威，将会遇到无穷的麻烦。葡萄牙人哪里知道这么多讲究。他们简单地将一封封口的信交了上去，里面当然没有什么朝贡的话。广州那些熟知外事礼仪的中国翻译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处理这些事，还没有打开信就把葡人向风慕义的急切心情翻译出来。这样，皮雷斯被热情地邀请到北京陛见。可是当北京朝廷官员打开来函，不禁勃然大怒。客人的礼品被拒绝接受，使节也被指斥为妄人，结果在明朝冰冷的监狱里断送了性命。但是一旦机灵的葡萄牙人熟悉这些礼节的内容，后来的对华关系就顺利得多。1557年明朝允许葡萄牙人暂借澳门作为晾晒货物之用。此前的1543年葡萄牙已经在日本的长崎港落脚。这样因倭寇问题而冷落了的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就通过葡萄牙人的居间作用而热络起来。他们把中国的丝绸销往日本，把日本的银子运到中国。1639年由于天主教徒的起义，日本实行拒绝西方文化的锁国政策，才结束了这种贸易关系

17世纪荷兰人继承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事业，他们试图取代葡萄牙在中日贸易关系中的位置。荷兰人在日本取得了成功，日本将军锁国后，葡萄牙人被驱逐，荷兰人却被允许留下来，西学被统称之为“兰学”。但是，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1622年曾试图强力占领澳门失败。英国人似乎比较精明，他们通过与葡萄牙人结盟的办法达到了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目的。在明清君王身边得宠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也不会去说英国人的坏话。相反，荷兰第一次官方使节出使北京之所以失败，据说就是由于代表葡萄牙天主教利益的德国人汤若望利用翻译的身份，说了许多对荷兰人不利的話。葡萄牙人在17、18世纪还受到中国官府的信任，尽管其政治势力在欧洲舞台上已经不值一提。

当时最大的对华贸易商是英国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18世纪中叶逐渐向东亚转移。英国人成功的秘密在于把北美的食糖与中国的茶叶贸易结合起来。茶使人精神兴奋，糖使人精力充沛，茶与糖的贸易使英国人财源滚滚。他们的贸易事业从太平

洋东岸到大西洋西岸。海上贸易扩展了英国人的海上势力和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联系。伦敦很快成为金融中心。1761年东印度公司经营了第一笔从广州到伦敦的私人支票汇款。一个在广州经商的商人临终前把其财产用这种方式汇到了故乡的遗产继承人手里。此后越来越多的私人客户委托支票汇款。那些把印度棉布运到中国销售的英国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支付在印度的货款或者把钱汇到伦敦。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华贸易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英国人不仅经营转口茶叶贸易，而且在英国本土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十分大。1750年英国人年均茶叶消费是半磅，18世纪末已经升至2.5磅。^①而茶叶的价格则下降了一半以上。价格便宜是茶叶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重要因素。为了从事茶叶贸易，英国人专门设计建造了快速的克力浦（Clipper）帆船，以便保证从广州运出的茶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运抵伦敦。尽管荷兰人曾经是对华茶叶贸易的开拓者，但是英国人却后来居上。荷兰人只是偶尔把一些茶叶作为搭载的捎包从中国运到巴达维亚，再带到阿姆斯特丹。1750年荷兰人在广州外国货船的航运能力中与英国人旗鼓相当，20年后英国人的航运能力已经是荷兰的三倍。贸易上的发展需要政治关系来维持。1793年英国派遣的使节马夏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与乾隆皇帝的礼部官员们为了朝贡的礼仪争执不下。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英国使节用觐见女王的单腿下跪礼陞见乾隆，清朝方面则以接见活动是在行宫而非北京大殿举行而同意简便行事。清朝人客气地把英国客人送出了国境，但是英国人企图把对华贸易官方化的企图却仍是泡影。英国人无耻地用罪恶的鸦片来平衡对华贸易的逆差，结果使

^① 此据 Dielmar Rothermund, "Pfeffer, Silber, Seide. Europas Weg nach Asien 1500—1800", *Europa und die Kaise von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1985, S. 55. 吴建雍据另外的资料作 1791—1793 年英国人均年消费茶叶 2 磅，见《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7 页。

清朝在对外贸易中原本丰厚的白银盈余化作了一缕清烟并由此而消失殆尽。

从达·伽玛到马夏尔尼的约 300 年间（1497—1793），世界历史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找到了通往亚洲的海上道路，输出了无数白银，输入了无数珍贵物品。那些从事这场贸易的国家特别是荷兰和英国因此而富裕起来并且决定性地促进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爆发决不是偶然的。它们与东方贸易有互动的关系。远东的贸易促进了欧洲大国势力的转移。地中海或者中欧地区再也不是欧洲形象的代表了，风水转到了北大西洋的边缘海域，是这些国家在从事世界贸易事业。这是一场竞争活动。航海知识的机密是很难长期保持的，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学去。300 年间海上势力此消彼长，旧的竞争消失，新的又会产生。当 1641 年荷兰人接受了葡萄牙人的马六甲后，再也没有人会想起 15 世纪威尼斯令人垂涎的海上封锁线。因为地中海地区的东方商品早已由大西洋提供了。威尼斯只是意大利众多沿海港口中的一个罢了。对于荷兰人来说，1641 年占领马六甲的意义还在于，他们在远东终于抢在了老对手英国人的前面。17 世纪末叶，荷兰人也投资在英国伦敦，特别乐意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新的竞争来自法国。

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试图按照他的方式寻求进入远东的道路，但是没有成功。路易十四与他的精力充沛的大臣考尔伯企图也以王家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英国人一决雌雄。但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首次远东航行就遭遇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领头的海军军官侥幸地搭乘上一艘荷兰船只才逃回到欧洲。“太阳王”试图送一些礼品给康熙大帝，建立双方的联系，但是也没有给法国带来直接的商贸利益。整个 18 世纪法国在远东贸易中都是处于边缘的地位。法国船队偶尔也贩运一些茶叶到欧洲，那几乎只能看做是蒙混英国人海关的一种走私。然而同时期的法国“中国

热”却由于法国传教士在华的卓越工作而直线升温。

为什么是欧洲发现了亚洲，而不是亚洲去发现欧洲？深刻的答案也许是欧洲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处在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时期；而亚洲各国比如中国却面临政治稳定遭到破坏，经济走势趋于衰落的局面。但是从现象上来看，最为简单的答案是当时亚洲有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欧洲人却需要亚洲的香料和珍宝。典型的事例是，热衷于这种转口贸易的都是巨大的港口城市，诸如威尼斯、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欧洲大陆列强如德国和法国，几乎没有插足其间。那些港口城市集中了信息、知识、财富和权势，具有浓厚的开拓意识。欧洲各国时常开战，也在互相学习。相反，亚洲国家之间联系松散而迟缓。广州十三行是官府垄断组织，旨在限制外贸的进行，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的私人商贾即使像郑芝龙这样巨大的海商集团，也逃脱不了通过贿赂买官而官僚化、通过买田置地而地主化的命运。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于西方各国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反观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却远远处于优先的位置。1500—1800年欧洲关于远东的图书，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

第三节 郢燕书说 传教士与早期西方汉学

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在华耶稣会士。1515年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丢失了不少地盘但是不久，天主教势力又反扑过来，出现了所谓反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一方面试图在欧洲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仰者，另一方面又企图扩大在海外的新教区。修会的复兴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534年西班牙人罗耀拉在巴黎创立耶稣会，1540年获得教皇承认后，便以矢志忠于罗马教皇

为职志，并有效遏止了新教势力的急遽发展。耶稣会士也充当了在海外拓展传教区的急先锋角色。于是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就裹挟着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向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世界各地迅速扩张起来。

耶稣会士在华的代表性人物是利玛窦。利玛窦及其继承者们领导的中国耶稣会组织，要定期地向罗马教廷报告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情况。例如 1610 年利玛窦死后，金尼阁在他的 1610—1611 年度报告中，详细报告了各个教区的情况，还有关于中国的许多知识，如关于中国的历法介绍，关于利玛窦的墓葬和明朝官员为利玛窦写的墓志（第 110 页）；关于中国历史纪年问题（第 128 页）。还提到了利玛窦的日记（第 17 页，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又如卫匡国给枢机主教的一份 48 页的报告中，以 58 位在华耶稣会士的名单开始，提到 1636 年在中国的南京、浙江、江西、山东、福建、河南、陕西、山西、北京大约有 40000 名教徒。报告对耶稣会士为什么努力在宫廷和士大夫中间发展教徒的原因作了解释，还描述了送给中国皇帝礼品的情况以及所激起的反应。报告最后是耶稣会士中文作品的目录。

殷铎泽 1672 年元月 25 日在罗马写了一份给传信部主教会议的报告，其中总结了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之间的在华传教工作，揭示了在华发展天主教徒的一些数字。1581—1650 年受洗教徒为 150000 人；1650—1667 年为 105000 人。其中 1656—1664 年在海南岛就有 19000 人受洗。截至写这份报告时，耶稣会士在华有 41 个工作据点，159 座教堂。多明我会 11 个工作据点，23 座教堂，发展了 3400 名教徒（1656—1664 年间）。方济各修会有一个据点，3 个教堂，发展了 3500 教徒（1633—1660 年间）

除了正式的报告之外，他们还出版书籍，还通过私人通信等方式向欧洲介绍远东发生的事情。

17 世纪末叶，俄国东正教也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清人称

为“罗刹庙”。^① 169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法文本关于俄国代表团在清朝的报告，题图铜版画上就是俄国人在呈奉贡品时规规矩矩地向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的情形。1667年之前有许多俄国使节被清廷拒绝，其原因就是不愿按照清朝的要求行礼如仪。沙皇俄国是第一个屈服于此等礼节的西方大国。1712年俄国迁都圣彼得堡，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劲头正足。1719—1721年沙皇又向北京派遣了一个官方使团，随团教士文菲尔扎格特（Georg Johann Unverzagt）也描述了清廷接见时的朝贡礼仪情况。1725年在德国吕贝克出版的这部报告还有一张关于北京的插图，其中心位置就是举行叩头礼仪的紫禁城。同行的还有一位苏格兰大夫叫约翰·比尔，他在1763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出版的旅行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次旅行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的路线图。根据1728年《恰克图条约》的规定，俄国可以定期向北京的俄罗斯馆派遣教士，那里大约有几名司祭和10名左右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生。他们既是俄国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培养俄国最早的汉学家的摇篮。^②

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中法国人的比重在增加。康熙以前法国来华的传教士只有26位，康熙以后达到89位，仅次于葡萄牙而占第二位。这些人在18世纪的中西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活跃。1702—1776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书信集》可谓欧洲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源。该书的第1—8册由郭弼恩（Patres le Gobien）编辑，第9—26册由杜哈德编辑，收录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的书信和报告。杜哈德在1731年编辑该书信集第20册的时候，就在里面登了一份新书预告，说他正在编纂一本叫《中华帝国详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的书。1733年又专门印发了一份说明书。1735年正式出版，对开四大册，精选了27位耶稣会士的报告

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起。

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二章《俄罗斯馆与汉学》。